

清明的清晨,起床发觉朋友圈里钢琴家孔祥东面对着窗外的晨曦弹奏了一首他创作的《思念》,那舒缓缱绻的曲调勾起了我的一片思念。

十年了,我亲爱的大姐离开整整十年了,我至今常常会追念她。记得十年前一个寒冷的冬夜,半夜里我被一阵急遽

心中的泰坦尼克号

陈圣来

的电话铃声闹醒。许久没有这样的半夜“机”叫了,那还是多少年以前当东方电台台长期间,半夜里经常会响起电话铃声,接到一些宣传的指令。

现在已经不习惯这样的半夜铃声了,惴惴地拿起电话听筒,是小姐姐打来的,她告诉我大姐刚才突发脑溢血,已送医院。我听了如雷轰顶,连忙穿好衣服,到马路上去拦出租车,那时网约车似乎还未普及。赶到医院急救室,大姐已没有知觉,在上呼吸机。我急切地要求值班医生开颅引流,但医生认为太晚了。

守在大姐榻榻旁,看着昏迷中的大姐,往事历历。大姐长我十几岁,她的一份和蔼慈祥温婉,犹如母爱,给我们姊妹带来沁人心微的暖意。那时家里孩子多,经济比较拮据,一个个书包就是一份沉甸甸的经济负担。大姐考进大学,率先离家住校,那时大学生是有饭费补贴的,然而她会把她可怜的一点点的饭费省下来,接济姊妹。一次,三姐在学校里不慎将热水瓶打碎了,三姐不敢和家里讲,大姐得知后,悄悄将省下的饭费给三姐买了热水瓶送去。事后我看到姐姐之间的信件,才了解此事。

我深深为姐姐们相濡以沫的情分而感动。记得有一次,大姐回家主动揽起家务,为家里拖地板,她个子瘦小,在洗拖把时,长长的拖把柄把水池边邻居的窗户玻璃打碎了。大姐连忙到附近五金商店,配好玻璃,然后买好桐油泥,回来后,用她少女的纤纤玉指,装上玻璃,然后一点一点将桐油泥搽到窗框上。以后我们在水龙头下洗东西,总能看到那窗玻璃四周桐泥上大姐歪歪扭扭的指纹。

大姐是学力学的,毕业后就一直献身于我国的航天事业。由于学工科出身,她的动手能力特强,文革中做的煤油炉就像一个小煤气灶,喷吐出蓝色的火焰,非常实用,成为访亲会友的馈赠佳品。特别是她精心制作的毛主席像章,用有机玻璃衬底,用小锉刀把棱角打磨成多边形,用绿油一擦,就像现在流行的施华洛世奇水晶一样,晶莹剔透,别在胸前,熠熠放光,令人艳羡。然而,更难得的是这位航天局的高级工程师,却是我从文的推波助澜者。

年轻时,大姐画得一手很棒的铅笔画。一次她画的一幅铅笔画把我震住了:夜阑如水,皎洁的月色里,一位纯洁少女穿着洁白的连衣裙,倚坐在大理石的窗台上,沐浴着月光,思念着远方的情人。这份意境令我怦然心动。原来这是托尔斯泰小说《战争与和平》中的女主角

娜塔莎,大姐是从小说的情节中根据想象配的插图。我正豆蔻年华,世事懵懂,然震撼于这幅插图的意境,才去啃这部皇皇巨著,尽管当时似懂非懂,但也算受到托翁的熏陶和启蒙,日后又读了《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这成为我踏入

文学殿堂的启蒙。前些年有幸访问托尔斯泰故居,我还专门去寻找小说里娜塔莎坐过的窗台。

后来,大姐从工厂第一线调入了航天局,有一度我们姐弟几个都工作在外滩,我在北京路,大姐在九江路,二姐在滇池路,三姐在南京路,有什么事串个门比打电话还方便。转眼开始到了退休的年龄,大姐率先上大学也率先退休,记得刚退休时,大姐兴致勃勃去文具店买了一大堆毛笔宣纸什么的,她想找寻回孩提时的兴趣,重拾绘画书法的爱好。然而她终于没能这么做,她像中国大多数妇女一样,退休以后奔波操持于烦琐的家务,操持于子孙辈忙不完的琐事,渐渐遗忘了自我,日夜蹉跎在厨房和菜场,疏忽了她的青春追梦,冷落了她的浪漫情怀。

有时我们姐弟对话会聊起如此话题,她总是显得无奈而又有一种释然地说,帮助孩子是父母的一份责任和义务,等第三代长大了,我们也可以解脱了。但是她似乎没有想到,我们的到第三代成人了,她也垂垂老矣。即使到那时候,她也不会清闲,中国老人那种责任感,那种牺牲精神,是一种无形的嬗递,绵绵不绝。

有一次“五一”长假,我请姐姐、姐夫们去普陀山游览。傍晚,我们在甲板上聊天,游轮起锚启航时,一声鸣笛,大姐忽然登临船首,面向滔滔江水,她奋力向上舒展双臂,做出了电影《泰坦尼克号》中女主角露丝的标志性动作,一下子把我们围观的姊妹惊呆了。大姐夫一时也老夫聊发少年狂,冲上去从后面抱住大姐的腰肢,迎着猎猎江风,在暮色苍茫中,这一对老年夫妇拥抱大江,拥抱未来,这是一张中国版的活生生的《泰坦尼克号》电影海报。瞬间,我们大家都被感动,有一种神圣感和肃穆感油然而起,时间与空间仿佛凝结了。迟迟,我们姊妹才一起欢呼喝彩起来。我似乎真正看到了中国老人尤其是老知识分子身上深藏着的浪漫情愫,只是平时被繁琐的生活遮蔽了,掩盖了,她需要激发,需要释放!然而,我们粗疏了……

这一夜如同365夜中的任何一夜那么平常,大姐拾掇好家务,搂着小孙女安稳入寝,然而,谁也没有料到,就此她真的独自去远航……记得我孩提时,每当星期天傍晚,大姐早早在家吃好晚饭赶回学校,我总会送她到弄堂口,夕阳下,看她长长的身影渐渐变短,渐渐淡去,心里总留下一丝依恋与惆怅。如今,每每想起大姐,又会浮现这一情景,然而,大姐真的渐渐远去,我心中的泰坦尼克号真的沉没了。

周末,小贺一家四口来做客。席间,聊起读小学四年级的大女儿的学习情况,小贺立刻愁眉苦脸了。夫妇俩异口同声地抱怨:对学习提不起兴趣,永远抵达的是目标的下线,从来不愿意为上线而努力。就没有什么孩子喜欢的,愿意主动付出的?夫妇俩又异口同声:看课外书!我们都担心她看不懂的外国小说,看了两遍。嗯?我认为这是小姑娘的优点啊。

最近,我在读《旅人》,是194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汤川秀树的回忆录。汤川是日本诺奖第一人。虽然汤川家是典型的书香门第,父亲是地质地理学家;母亲绝非单纯的家庭主妇,是读过两年女子学校,还略通英文的新女性。但无奈家中孩子颇多,汤川秀树上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下有两个弟弟,父母实难照拂周全。秀树性格有些沉默,总说自己是阳光照不到的角落。在家里,书籍是孩子们最好的朋友。父亲本是文学爱好者,藏书甚多。对于孩子们来说,可谓阅读无禁忌。秀树读小学时,不仅读完了《天阁记》,还读了安徒生的《童话》和《格林

童话》的日译本,像《少年世界》和《日本少年》一类的杂志也读了不少。秀树的母亲也是杂志爱好者,经常在房间的桌子上放几本儿童杂志,供孩子们翻阅。秀树回忆说,他读书是不分场合地点的,书房的桌边、后院的外廊,都是他阅读的好场所。还未上初中,《里见八伏传》《三国志》和《水浒传》,他都读过了,也能欣赏近松门左卫门和井原西鹤的净琉璃作品,最重要的是,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很感兴趣,成年之后仍然喜欢。少年时,没人能看出秀树未来会成为物理学家。

除了阅读自由,父母对“用功读书”的理解也与众不同。父亲非常不喜欢“死用功”的人,他希望每个孩子都能深入追求适合自己的学问,他认为在学校中仅仅为了取得优异成绩而用功是最愚蠢的。

阅读即教育

夏丽柠

夜光杯

全世界的大都市都伫立着欲比天高的玻璃摩天大楼,而同一幢楼里的人却彼此生活在陌生的国度。我不理解你的节奏,你不懂我的审美;我不懂你的梦想,你不关心我的去向;世界大同了,悲喜更不相通了,人与人的交流和纽带只能维系在利益中吗?

六点不到,司机已经在楼下等着。主办方给我约了一辆专车,司机打开音响,巴赫的无伴奏大提琴组曲悠悠传来。最近发现,专车和快车选择的音乐也不尽相同,普通快车大多播放《梦中的婚礼》。在大提琴循环往复的音符中,专车穿过延安路高架桥,穿越越江隧道,天尚未黑,陆家嘴的街灯已经亮起来了。晚上将在上海中心的某个会议室里,给白领们做一场小型古典音乐沙龙。时间尚早,便在陆家嘴附近转转,远远近近地观赏附近的钢筋玻璃大厦。

记得上一次来浦东,是一个深夜。车开在高架桥上,两旁的大厦



柳烟

齐铁偕 诗书画

风斜,雨细 / 杜鹃声声里 / 杨柳,不知不觉 / 覆盖了千里江南

前提是“适应”

邓伟志

在大大小小的运动会上能拿到冠军的总是少数人,而多数参赛者被落在后面。

在人群中也一样,走在前面的排头兵极少,但排头的会带领大家前进。不用说,如果排头的脱离群众,大家是不会跟他们走的。这就要求先进的同志要密切联系群众。有部反映八路军的电影,其中有镜头发人深思:八路军一进村便与群众打成一片;而群众也立即起来安排战士的吃住,做八路军的“后勤部”。打成一片是十分必要的。假如你站在摩天大楼上向地面的群众大喊“加油!加油!”群众会听吗?反过来说,你下楼撸起袖子与群众一起干,你再喊“加油”,大家就会手拉手、肩并肩,踔厉奋发,砥砺前行。

适应群众,方能联系群众,然后带领群众,这是社会发展的三部曲。

读初中的秀树,疯狂迷恋数学,尤其是几何,但因为不喜欢数学老师凡事看成绩的教学方法,放弃了为数学而努力。那时,他表现出了对欧洲历史的浓厚兴趣,也为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流过不少眼泪,甚至考虑起“什么是人生”的托尔斯泰式的诘问。研究《老子》和《庄子》,让他在少年时期,还产生了些微妙情绪。

通过阅读带来的情绪变化,修正了秀树的成长轨迹,也坚定了他的思考。等到填写大学志愿时,他果断地将子承父业的“地质学”改成了“物理学”,原因很简单,他在假期时阅读父亲的专业书籍,一点也提不起兴趣。我们常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但每当兴趣与应试教育背道而驰时,家长就会变得忧心忡忡。课外阅读的目的,是为了让孩子打开面向世界的窗口。阅读即教育,那是教会孩子如何把握人生的教育,是教会他们如何在人生里向上攀登的教育,无人能够代替。

书与人 汉语之丰饶,离不开译者群体的贡献。 责编:郭影

玻璃之城

田艺苗

呼啸而过,白灯在视网膜上留下长长的约等号影子。夜上海不再是花样年华、霓虹香艳,所有玻璃大厦都彻夜亮着灯。即使在午夜,天空也被照得一片灰白,在冬季的树影之上,时间和天空仿佛都凝固不动。

各种摩天玻璃大厦甚是炫目,仿佛《银翼杀手》的世界在你眼前拔地而起。有些彻夜白亮,有些装点着广告词,有些玻璃幕墙上闪烁着彩色视频,映衬着大楼更幽暗寂静。午夜的玻璃大厦别具戏剧力量,像一副昂贵的墨镜,戴上它,你熟悉的城市顿时变成了明星,炫酷冷峻,期待着人们的仰望和陶醉。

少即是多。这句现代派格言广为人知。但很少人知道,它出自钢筋玻璃大厦的创始人,密斯·凡·德·

罗。早在1919年,凡·德·罗便提出了建造摩天玻璃大厦的大胆设想,钢框结构可以透过大片玻璃被看到,就像骨架透过皮肤。直到五六十年代出现了可以降温吸热的玻璃和荧光灯之后,他的设想才得以实现。这种建筑建造起来速度飞快,造型简洁,造价便宜,极易模仿,它把全世界的大都市都变得一模一样,从芝加哥到上海,从悉尼到新加坡,摩天玻璃大厦变成了现代主义和机械工业时代的纪念碑。

在这样的大楼里上班,大概是很年轻入的梦想。但除了这些,人生还有什么值得追求的东西吗?100年前的热情咏叹调,让周围忽然安静了下来。人的嗓音和嗓音背后的悲伤,就像是一种肉身的奇迹。艺术是治愈还是救赎?感情是归宿还是劫数?但生命不能无所寄托,个人总不能总是戴着墨镜生活,还是要走下摩天大楼,去吹吹自然风,去阳光普照的街头,去踏实生活。

一块“木板借条”

凌河

这张照片,也许您没有见过,但这个故事您一定耳熟能详——三野解放大上海的那个雨夜,十万大军睡在马路上过夜,十里洋场的百千广厦、大都市的百万民舍,解放军没有一个人去敲门,连借一口水喝也没有。“露宿街头”的照片,被刊登在翌日的本埠报纸上,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远隔重洋几经辗转看到了,说了一句他终于明白了共产党为什么“得天下”!

这座碾盘,也许您没有注意过,但这个故事这几年却被青年一代热议详论——早在1938年夏秋之交的一个漆黑五更,山西黎城县孔家山村村民郭建仁打开家门,发现门前场上,竟睡着二万多名八路军,一位长者则睡在门外的碾盘上。原来这竟是一整个八路军总部机关,由朱总司令率领于午夜进入孔家山村,为了不惊醒熟睡老百姓,没敢一下门,没进一个人,悄无声息地在露天场院上睡了半宿,而那睡在碾盘上的,就是年过半百的朱老总!

一张照片,一座碾盘,已经成为共产党“得天下”的注脚细节,而近时之间,一张“借条”却同样引出线上线下的热烈议论——在四川松潘红军长征纪念馆里珍藏着一块并不普通的木板,长约1米,宽约20厘米,木板顶部是三个繁体字“割麦证”,下文竖排写着:“老庚:我们在这坵田里割了青稞1000斤,这块木牌可作为我们购买青稞的凭证,请你们归来后,拿这块木牌向任何红军部队或苏维埃政府,都可兑取与青稞价值相等的银子、茶叶等,未曾觉得前需好好保存这块木牌。红军前敌总政治部,麦田XX号”。

那是1935年7月,红军从川西北高原黑水翻越打鼓山到达松潘西的毛儿盖藏村,时值青稞成熟,但红军到来之前,反动宣传将红军妖魔成青面獠牙,所以藏民都躲进山里,无人收割庄稼,面对找不到

主人的青稞地,红军只好自己动手借粮,但按照总政治部的严格命令,每收一坵青稞,就必须留下一张“借条”,以便藏民回村后凭此向后续部队兑现银两……这就是“木板借条”的故事,当然像这样的“借条”,军史上并非仅此一张——曾有记者为再现刘邓千里跃进中原的细节,到大别山去“寻根问底”。一个山民,拿出一根布条,“借你们看一下”,就迫不及待讨了回去。什么稀世珍宝,如此珍贵呢?原来这是一个借条,上书“中原野战军第X纵队第X团借到盛易记老板黑棉布四匹”。这是当年中野进入大别山,天寒地冻,战士尽着单衣,于是刘邓首长决定借布,严格规定了借借手续,并立据日后一定“随还还钱”。“得天下”后,不论在重庆,还是在北京,刘邓数次追问此事,总觉“于心不安”、耿耿于怀,于是政府多次出布告示,要求人们“凭条兑现”,按现行市价还钱。然而也有老百姓不肯交出借条的,据说一些山民把布条带在身上,遇到有特权欺民、鱼肉百姓的,就拿给他瞧!

从一张照片到一座碾盘,从一块“木板借条”到一个“布条欠据”,在极为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人民军队尚且坚守“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决不侵犯人民利益的“三条底线”,人们从中解读共产党为什么“得天下”的奥秘,不是没有道理的——难怪今天的我们,站在被作为国家一级文物而陈列的那一块“木板借条”面前,会觉得这不啻是一堂党史军史的生动课程,不啻是富有“针对性”的党纪军规的严肃诫勉和深刻警示啊,它强烈的无声示范中蕴藏的历史指向性和鲜活现实性,难道能够轻忘吗?!

